

經濟理論與經濟史論文集

邓力群 钱学森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

邓力群 钱学森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410千字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册

统一书号：4209·7 定价：2.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知名学者、教授邓力群、钱学森等撰写的论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学术论文。其中有论述当前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如关于我国的职工教育等；有论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若干问题，如中西古代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传统；还有论述国际经济中若干问题，如国际经济研究与数学方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技术输出是现代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特征，殖民地经济以及经济管理等等。本书内容充实，论述清晰、资料丰富，对于经济科学，特别对经济史与国际经济的学习和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说 明

本书是由国内知名学者、教授邓力群、钱学森、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巫宝三、滕茂桐、易梦虹、赵靖等撰写的学术论文，以此纪念北京大学经济系赵迺桢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

赵迺桢，号廉澄，于1897年3月28日(农历2月26日)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赵迺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03年，赵先生开始学习古文，1904年考入杭州江干小学，受初小教育；1908年考入浙江两级师范附属模范小学高小读书，1910年升入浙江省杭州府中学。1915年冬他到上海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5月21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以示抗议，他参加了这一罢课斗争。1918年他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他当时受到北京大学经济门主任马寅初教授的影响，选择了法科的经济门作为自己的专业。1922年夏，他以优秀的成绩在北京大学经济门毕业，取得了文学学士。从1918年开始，他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年级英文教师四年。1920—1922年间，又担任国史馆的编辑，从事外国历史名著的翻译，以供中国学者参考。

赵迺桢先生于192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浙江杭州参加留美官费生考试，他考取第一名被录取。在等待赴美国留学期间，曾任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讲师，讲授货币学课程。1923年秋他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专攻经济理论，他选修了商业循环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撰写了以《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为题目的硕士论文，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继续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刻苦钻研，付出了大量劳动，他撰写的题为《理查德·琼斯：一

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的博士论文被通过，终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了英文本。

1931年他回到中国应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之聘请在该校讲授地方财政和土地经济学两门课程。

1931年9月他应聘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1933年10月7日北京大学校务会议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当然委员”，1933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决议：赵迺抃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他在坚持教学、科研之余，还担任过学生组织起来的一些学会的导师，如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他应北大同学范长江、张镜航等的聘请，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导师。

在抗日战争时期，赵迺抃教授参加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迁校工作，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旅行团团长，向长沙迁移，后又于1938年辗转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仍担任经济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初，北京大学派他提前赶回北京，担任北京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总务长。1946年秋北京大学建制恢复之后，他继续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还兼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教课之余，他和同学们比较接近，经常指导同学们的科学研究和业余学习。对于正义的学生运动，他都表示同情或给以支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大经济系女同学黄淑生被军警用刺刀刺伤腰部，他得悉后深为悲愤，并赶往医院看望和慰问。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前往“一二·一”四烈士灵堂致祭，并手书挽联，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还经西南联大教授会选派为代表，前往见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卢汉，要求惩

办凶手和保证大学的安全。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即将覆灭的前夕非法逮捕了北大经济系同学孟宪功等，他对此表示愤慨，并两次前往伪特种刑事法庭的监狱探视孟宪功等。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赵迺桢教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南下邀请，也拒绝了最后派来接往南京的专用飞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解放后，赵迺桢教授主动开设新的课程“价格概论”。他还接受经济系同学们的建议，延聘经济学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等职务，来讲学的有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同志，他还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南汉宸、何长工等来经济系作专题报告。

1951年，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和北大经济系师生们一道到广西省柳城县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争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贡献。从1952年夏，我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他仍继续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

赵迺桢教授在担任教学工作 and 教学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坚持不断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他就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北大经济学报》、《中国大学经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多篇。抗战时期，他经常在《大公报》、《云南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星期论文”。从抗战胜利到北京解放前，他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经济评论》、南开《经济周报》、《现代知识》等书刊上发表过“五十年来美国经济思潮的主流制度经济学派”等许多学术论文。又在《大公报》、《中苏日报》、《益世报》、《平明日报》、《天津民国日报》、《华侨商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数十篇“星期论文”和“专论”。

1948年夏，他完成了大学用书《欧美经济史》的定稿，（全书45万字）。这一专著是他在二十余年来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

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该书对欧美经济思想家及其流派包罗较为完备，对其中至少76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经济学说作了专门的介绍和论述。此外，他在解放前写成的书稿还有《商业循环》上下两册、《社会主义史》上下两册等等。

解放以后，他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他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到1958年已经编就《近代重要经世学者之生平简介》、《历代经世学者之姓名及其重要著作》等。他继续整理出分散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若干专著内的经济思想资料，编辑一部大型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资料专著，定名为《披沙录》。其中《披沙录》之一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到1981年，赵迺传教授任教已56周年，1979年底，他的学生和同事钱学森、邓力群、何锡麟、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赵崇龄、胡代光、易梦虹、徐璇、赵靖、闵庆全、罗真端、杨道南、范家骧、赵辉杰、马雍、张盛健、洪君彦、付骊元、厉以宁、巫宁耕等倡议出版此学术论文集，以纪念赵迺传教授任教56周年。

赵迺传教授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已经56个春秋了。他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研究事业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北京大学经济系有鉴于此，于1981年5月27日举行了“赵迺传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庆祝大会”，庆祝他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作出的显著成绩，祝愿他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事业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职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邓力群 (1)
国际经济研究与数学方法	钱学森 (6)
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外汇平衡问题初探	滕茂桐 (12)
试论最佳消费率的选择	刘方棫 (25)
试论企业部分所有	智效和 (41)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集市贸易	叶方恬 (56)
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	巫宝三 (68)
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向西方寻找真理”	
的传统	赵靖 常卓超 (99)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马 雍 (119)
番薯的引进和早期推广	李德彬 (139)
创办时期的福州船政局	蒋建平 (172)
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与我国的经济	
调整 and 改革	朱懋庸 (183)
经济关系中的权利问题	张友仁 (196)
报酬递减规律和农业发展	范家骥 (217)
作为一种工具的无差别分析	蒋光远 (241)
国际经济学界关于贸易比价长期趋势	
问题的论战	姚曾荫 (250)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陶继侃 (283)
技术输出是现代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特征	傅骥元 (317)

马克思关于工资国民差异的理论	张秋舫 (337)
论殖民地出口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道路——二十世纪初 期英属东非经济史比较研究	陈振汉 厉以宁 (352)
印度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比较分析	巫宁耕 沈振宏 (376)
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与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	赵辉杰 (395)
论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工场手工业	张盛健 (419)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一体化问题	易梦虹 (439)
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的编制与分析	闵庆全 (452)
美国企业管理理论学派及其动向	杨道南 (479)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管理对西方经济 发展的影响	田万苍 王茂根 (495)
略论熊彼特著《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 经济学家》.....	宁嘉凤 (507)

职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环节

邓力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地扩大再生产，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也将不断巩固和得到发展。就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来讲，应该既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又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说，应该既包括使现有劳动者的体力、智力越来越好，又包括使现有劳动者的子女，在体力、智力方面都胜过现有的一代，而且以后一代比一代强，后来者居上。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特别强调地指出，职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该看到，我们的很多同志在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上很用心，甚至钻进去了，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类人才。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是有的同志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中包括体力的增强、智力的开发，注意得不够，甚至于很不够。解放初期，我们曾经在各地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速成中学虽然主要是学政治、学文化，没有进行多少专业训练，但是对于提高我们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还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后来从干部、职工中选送过一些同志进大学，这项工作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对于干部、职工的教育工作，也同我们党的其他工作一样，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当时大学中的工农兵学员，除了象张铁生这种紧跟“四人帮”的“白卷

英雄”外，绝大多数还是好的。问题是“四人帮”一天到晚搞什么抓“走资派”，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即使进了大学，实际上既学不到真正的马列主义，也学不到多少专业知识，相反，倒是天天听到“四人帮”的反动宣传。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我们同志对职工教育工作重视不够，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从我们这方面来说，的确要考虑到，由于中国长期落后，历来不注意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而我们党又是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经验不足，领导干部中文化科学水平低的同志多，的确也容易产生放松职工教育、忽视智力开发的倾向。

生产力当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机器是人制造出来的，由人操纵的。因此，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起码要和关心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放在同等地位。否则，即使有了再好的机器，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我们这一代建设了许多工厂，而且建设得很好，也不能进行科学的管理。这就会大大影响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把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同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同我们进行革命的目的是符合的。我们为什么要干革命，要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好，为了随着社会的前进，使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并且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只注意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不注意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注意培养一代胜过一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我们多年工作中的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后者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我们的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都希望而且已经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以便掌握更多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身体更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体力、智力方面都超过自己。中央、国务院代表群众的这

种深切愿望，并且考虑到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已经正式作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就是要把职工教育提上日程，并且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决定》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几个方面，阐明了职工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党政领导如果只抓生产指标的制定和完成，不重视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抓职工教育，甚至把职工教育看成是耽误生产的额外负担，那就说明这些领导人患了近视病，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现代化建设，并且说明他们缺乏关心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相反，企业党政领导人如果坚持不懈地抓住职工教育，非常关心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并且善于引导职工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那就说明这些领导人很有远见，在踏踏实实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真正重视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职工教育不仅在生产中，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时候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靠勤劳勇敢的苦干精神和人民才能的充分发挥，第二才靠丰富的资源。只靠资源是懒汉思想，会使自己腐败。可见抓好职工教育，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决定》在下发之前，曾经征求过不少同志的意见，反复讨论和修改过多次。我想就进行正规培训的问题着重讲一点意见。职工教育的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这要结合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不管脱产不脱产，都要正规化。胡耀邦同志讲过：脱产学习的成员，领导干部也好，普通工人也好，必须按文化程度编班。你是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和其他小学程度的职工编在一起；你是高中毕业的工人，就和高中毕业的其他人编在一起。这里不能够论资排

輩。编班以后，要按现有程度设置课程。课程有长有短，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志都必须学完。脱产学习是这样，业余学习也必须正规化，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人上课，有人辅导，有自修时间，都要正规化。教育部已经发布一个正式文件，规定业余学习的也可以参加考试。无论参加哪种形式的学习，学完了都要考试，达到高中毕业程度发给高中毕业文凭，达到大学毕业程度发给大学毕业文凭。这要作为将来安排工作、提级、调资的重要依据。当然，自修也好，业余学习也好，不一定同时学某一级的全部课程，可以一门一门地学。比如先学语文，语文学完了，就考这一门，就给你这一门的结业证。然后再学物理，再学化学，再学数学或其他课程。如果用几年时间把高中的所有课程一门一门学完了，都考试合格了，那末几年时间就达到高中全部课程毕业的程度了。工人提拔为干部，提拔成为工段长，要经过什么训练；工段长提拔成为车间主任，要经过什么训练；科员提拔为科长，要经过什么训练；科长提拔为处长，要经过什么训练，等等，都应该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刚开始还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很好，但是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所谓正规化，我的理解就应该这样。因为如果没有一套正规的制度，今天高兴了就来，明天不高兴就不来；或者名义上我上了业余中学，实际上程度达不到。这叫作形同虚设，是不会有什

么效果的。

技术学习同样要正规化。前些日子有一个访日见闻影片，选了日本的索尼电器制造公司作为典型之一。我们在日本考察时也常听到这个影片中反映的那种情况。尽管现在技术已经高度自动化了，可是他们的企业吸收人，都要先训练一年，叫做“制造者的训练”，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学徒工训练。一年的时间里，每门基本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正规训练。有这样的镜头，有个师傅领着几十个高中毕业生学习钳工技术。应该用什么动作往前

铨，用什么动作把铨拉回来，师傅在那里喊口号，哪个人不按规格办，就到眼前来指点你。还有镢头该怎么举，该怎么落；多少时间落一次，多少时间举一次，严格得很。他们认为，这种动作在流水线上已经不用了，可是这种基本功的训练还是必须进行的。还有走路，一定时间走多少，一步走多远，都进行严格训练。我们街上常常有些摇摇晃晃的人，日本人在街上总显得很紧张，好像不仅有目的，而且有严格的时间安排。还有搬东西，一定时间内搬多少、搬多远，需要作什么动作，也有严格的训练。我不主张把人搞成机器，但是不论从一个社会来说，还是从一个人来说，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办好、办完更多的事，或者说珍惜时间，讲究效率和质量，这样的训练在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本来，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重视全体劳动者从自然力的束缚、从旧的社会制度和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中的解放，重视人的体力、智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我们就是靠这个、为这个搞革命、搞建设并且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左”的东西的影响，一方面好象很重视人，其实搞了不少不见实效的事情。现在是恢复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的时候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搞好职工教育、开发智力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好条件，使我们的职工队伍经过不断的培训之后，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越来越好的队伍。

国际经济研究与数学方法

钱 学 森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领导亦正在努力规划之中。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所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脱离时代，要跟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不能停留于半个世纪前的老路子、老方法上。看来，古典学派作家所采取静态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用了。当然，这里说的是研究方法，不是指导思想。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用新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反过来充实和深化，以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有什么新方法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数学方法。从不用数学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到应用数学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或称经济计量学方法、数理经济学方法，是国际经济问题研究领域半个世纪以来的一项重大变革。看来，这件事在我们国家还有必要做些宣传。

下面我想就此谈点个人的看法。

能不能用数学方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经济领域中有沒有规律？有规律才能表现为数学关系，写成公式、方程。如果没有规律，当然也就用不上数学了。这个问题好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看，经济运动也是客观存在。而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总有其自己的运动规律。并且人可以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并掌握这些运动规律。其实，如果没有规律，那就用不着研究国际经济问题

了,反正是一团乱麻,无法认识,无法掌握,无法理出头绪来。认为国际经济关系需要研究,就是承认国际经济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不是不可知的。

有规律是个必要条件,但不能说就一定能运用数学方法。还要看看有没有满足的充分条件。第一,就要看国际经济活动的变化是否快到人们现在还无法看清的程度。看不清就不能精确地描述,不能精确描述,当然也就不能用数学方法。实际上,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变化,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或国际间的经济活动,是许许多多单个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即所谓宏观经济的变化。这是有相对稳定的准确的规律的。

自然科学里类似的例子很多。许许多多分子组成的气体,一个个分子的运动是变化多端的,人无法看清楚。但所有分子相互作用的总运动、宏观运动,却准确地服从气体定律,完全可以用数学关系精确地表达出来。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许多现象和变化属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可采用数学方法的。

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国际经济领域的活动和问题是许多个别经济活动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总的变化是宏观经济的变化,而且一个方面的国际经济活动也是宏观性质的。例如,个别出口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毫无疑问会影响出口数量的变化。但是价格波动影响各类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一般情况下,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出口价格都下跌时,耐用消费品国外需求量的增加幅度要比生活必需品增加的幅度大。这当然不是说某一种、某一项商品对某一家外商的交易,而是指某一类商品对某一国的国际贸易活动而言,所以它是各项单独可能活动的统计平均数。个别外商的单独活动是难以精确地预见的,但作为一项总量,作为统计平均数而言,象出口价格变动与出口数量变动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属于宏观经济。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国外对耐用消费